

## 「獨立評論」中有關三民主義的討論

陳儀深\*

獨立評論發行於1932年迄1937年，是由胡適主編的一份政論雜誌，主要的撰稿人是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1930年代是中國國民黨訓政的時代，也是中日關係緊張的時代，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人大都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對當時的憲政、外交、經濟、教育等等問題提出評論，本文只是在分析他們對三民主義的看法。

孫中山晚年提倡的「反帝」運動，在1920乃至1930年代蔚為風潮，胡適、蔣廷黻則認為反帝口號不切實際，中國人應該反省自己文化上、政治上的弊病，在胡適的心目中，批駁固有文化與他的民族主義信仰毫不衝突。關於統一中國應以武力或和平的方式為宜，獨立評論中頗有爭議，這方面的主張大抵與民主、獨裁的立場有關。在民權主義方面，胡適、張佛泉、蕭公權對「訓政」的批評不遺餘力，陳之邁對「五院制」的批評亦值得注意，不過自獨立評論中看不出明顯的替代方案，因為他們相信政制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此時此地的標準。民生主義方面，對於1930年代中國是否適行「統制經濟」亦有爭論，主張獨裁的丁文江認為中國尚沒有施行「統制經濟」的條件；對於農民問題，原則上「耕者有其田」無人反對，但是對於地主與佃農的負擔輕重則各有證據，看法不一。以上種種，隱約可以看出自由主義者對各種問題的一貫立場。

### 一、前言

### 二、民族主義方面

- (一)不倡「打倒帝國主義」
- (二)統一的方略與均權制度
- (三)固有文化與民族自信心

### 三、民權主義方面

- (一)檢討訓政論
- (二)對五權憲法的批評

### 四、民生主義方面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統制經濟的可能性

(二)農民問題的解決

## 五、結語

# 一、前言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是孫中山所建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實際上統治中國的時期，也是孫中山所揭櫫的三民主義，第一次有機會在全中國作試驗，從而，中國知識份子——尤指自由派知識份子——自然在這個時候對孫中山的思想作比較廣泛的、嚴肅的批評（若是基於黨派立場必須「擁護」或「打倒」三民主義的，不在此論）。首先，要以新月雜誌上胡適、羅隆基等人對三民主義的批評最為代表<sup>1</sup>，然而新月畢竟以文藝為主，政論文字不多，胡適隨後主編的獨立評論才是道地的政論刊物。

獨立評論週刊創刊於民國廿一年五月廿二日，迄廿六年七月廿五日出完最後一期，合計二四四期；文章計有一三一七篇，作者計有三五六位，其中撰稿在十篇以上的作者有廿三位，主要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sup>2</sup>。胡適一直是這份雜誌的主編，他若因事離開北平才由蔣廷黻或吳景超或任鴻雋或陳之邁代編，但為期都不長。胡適對獨立評論的創刊背景會有以下的描述：「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裏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裏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裏或在歐美同學會裏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胡適，1986 a：136）原來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偽「滿州國」不久即造誕生，充分暴露了日本軍閥的侵略野心，使得中國朝野陷入「國難時期」的悲憤情緒中，身處北方危城的知識份子自是感受良深；而獨立評論這樣的一份同仁刊物，自然與東方雜誌、國聞週報等具有商業性、新聞性的刊物大有不同，它比較能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反覆辯論，流露出一群知識份子的執著精神，反映出時代思潮的脈動。

由於孫中山仍是一九八〇年代海峽兩岸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本文揭露一九三

○年代的知識份子，藉獨立評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所引申的重大問題作過怎樣的評論，或許對當前的知識份子有些反省參考的功用。

## 二、民族主義方面

### (一)不倡「打倒帝國主義」

早在民國十九年，胡適和他的「幾個朋友」就在新月雜誌上認為，中國的真正敵人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不是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胡適，1986 b：6）到了獨立評論的時代，胡適延續這樣的看法，呼籲國人相信「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有病的」，這些病除了上述的「五鬼」之外，他還提到鴉片、小脚、八股等「三大害」，以及儀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等「三個亡國性的主義」，然後說：

所謂民族自救運動，其實只是要救治這些根本病痛。這些病根不除掉，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什麼民族復興，都是廢話。例如鴉片，現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並不用兵力來強逼我們銷售了，然而各省的鴉片，勒種的是誰呢？抽稅的是誰呢？包運包銷的是誰呢？那無數自己情願吸食的又是誰呢？（胡適，1932 a：10）

雖然國民政府建立的頭幾年，「反帝」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是就孫中山個人而言，除了晚年「聯俄」的階段，比較明顯地對西方列強採取敵對的態度以外<sup>3</sup>，尋求外援—或日、或英、或德、或美—是孫中山大半生的革命策略之一<sup>4</sup>；今日國人多以為孫中山是反帝的英雄，當是教育宣傳之下的誇大印象。從務實的觀點來說，孫中山所建立的政治勢力終其一生未有穩固的根據地，甚至全中國而言亦不足以力敵列強，「反帝」不免流於口號；不過從辯證的觀點來說，反帝的口號反映了國人的心理需求，藉此可以收攬人心、壯大力量，政治上的作用不容忽視。孫中山在晚年演講三民主義的時候，把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看作一體兩面，而要一併地去反對它，應是從以上的「辯證」觀點出發使然。

三○年代的中國，迫切的敵人是日本，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應不應藉重「國

際聯盟」來調停東北問題，頗滋爭議。胡適採取肯定的態度，他稱國聯調查團關於中日問題的報告書摘要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蔣廷黻甚至說「國聯不但是我們聯合世界一致對日的好工具，且是幫助我們實行現代化的一個好機關」<sup>5</sup>，當國聯調解中日問題失敗以後，接著處理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的問題又告失敗，很多學者說國聯已經沒落了，胡適則以為「國聯還可以抬頭」，傅斯年也寄望國聯的「復興」。(胡適，1936：2-5；傅孟真，1936：5-9)

由於自由主義者的特性之一是與人為善、反求諸己、承認自己有犯錯的可能性，所以獨立評論的幾位主要撰稿人對帝國主義、對國際關係採取以上的看法，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有時亦不免矯枉過正之嫌，例如蔣廷黻曾經說：

一切的有作為的，向上的民族都在那裡求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的膨漲……萬一甲的勢力膨漲過於乙的，如列強與中國之間，那末帝國主義自然而然的就來了。這是一種天然現象，無所謂善惡。如要談善惡和責任，那末強者與弱者是同等的須負責。(蔣廷黻，1933b: 10)

同樣是「列強」，為什麼有的對中國有領土野心，有的就沒有？其間應有善惡是非可言。因而「帝國主義」並非不可譴責，只要不是怨天尤人、推御責任，基於民族的自然感情譴責侵略者，誰曰不可？

## (二)統一的方略與均權制度

由於民國十七年中國統一的基礎並不堅實，後來除了發生十九年的中原大戰以外，二十年「湯山事件」又引起廣東獨立，與廣西聯合成一個「西南政府」的局面；二十二年有所謂的「閩變」，二十五年胡漢民病故以後又發生「粵桂異動」，他們都有堂皇的藉口，但是獨立評論一貫地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場，譴責這類「地盤主義」的作祟，這種「國難時期」的心情，或許就是蔣廷黻所說的：「沒有人說南京好或國民黨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後的不可收拾。」(蔣廷黻，1932b: 2)只是，如何進一步造成統一的局面呢？獨立評論之中卻有不小的爭議。

吳景超、蔣廷黻主張以武力甚至「個人專制」來達到統一的目標，他們從中外的歷史經驗認為唯有先求統一才有下一步的近代化，而唯有武力的方式才能求得統一；胡適則認為以中國當時的條件要「武力統一」是不可能的，他主張用政治制度(例如國會)來逐漸養成全國的向心力，逐漸造成一種對國家的「公忠」去代替當

時的「私忠」，才能有實際的統一。<sup>6</sup>陳之邁的看法又與以上諸人不同，可謂之「經濟統一論」：

現代經濟制度的發展之足以促成統一顯而易見的。……因為分工所以整個經濟制度各部份都有最密切的連鎖，他們不顧政治的區域，它們是超越政治區域的。……因為它能把歷史遺留下來的地方區域的單位性抹殺，而把各部份聯絡起來成一個整體。(陳之邁，1935：4)

由於孫中山當年在「南北分裂」的時候，曾經一方面要陳炯明充實軍力準備北伐，一方面派唐紹儀到上海進行南北議和；晚年改組中國國民黨加強了革命屬性，不久卻又鼓吹以國民會議和平統一中國，可見這方面他沒有固定不變的主張，三〇年代的國民黨不論採取前述諸人的「武力統一論」、「政治統一論」或「經濟統一論」，應皆不致於「違背總理遺教」，問題可能在：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所主張的「均權制度」，在三〇年代被陳之邁和蕭公權應用在「統一問題」的討論上面，陳之邁在二十五年發生「粵桂異動」以後，建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此時應有一種痛切的調整」，除了地方政府應認清養兵自重以對抗中央，是民族自戕的辦法，當為輿論與歷史所共棄之外，中央應該放棄集權的夢想，而且中央的責任比地方的責任更重要，也就是要開誠布公地提出一種切合實際的方案，與地方當局誠意磋商，共同制定一部「均權法」，以免一方制法一方守法，而為中央與地方所共同樂於遵守，所不忍踐踏蹂躪。(陳之邁，1936 a：6-7；陳之邁，1936 b：5-6)蕭公權對於這種建議不以為然，他認為實行均權須以政治統一為條件，而不可用「均權」作為應付地盤主義的工具，如果與統一不相容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實在只是均勢，而不配稱為均權。(君衡，1936：4)這時的蕭公權傾向單一制，注意的是原則問題；陳之邁傾向聯邦制，注意的是策略問題。由此可知集權分權的問題不能單從官制的形式中去求解答，尤應注意政治社會的背景。後來張佛泉對陳、蕭的爭議作了評論，他雖然不贊成以「聯邦」作為促進統一的方法，但是國家統一之後施行聯邦制並無不可，至於統一也不是絕對的，「在今日的局面下，我們應該承認凡在中央勢力範圍的地方都已是可以謀均權問題的所在」，這簡直是策略與原則的調和；最後，張佛泉認為「均權」並不是一種權由中央與地方均分，而是依權的性質，屬於中央的正不長其集，屬於地方的正不嫌其分，這實是一種「分治」，從而他建議若能改用「分治」二字或可避

免許多誤解(張佛泉, 1936 : 4-5)。張佛泉的這些意見,使孫中山的「均權制」增加了許多適應性。

### (三)固有文化與民族自信心

前文曾經述及,胡適心目中的所謂民族自救運動,只是要救治「三大害」、「五鬼」等文化上的根本病痛,然而在一般人看來,這樣厲害地批評傳統文化,恐會打擊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一位「子固」先生就說:

要建立一個民族的信心,決不能從罵我們的祖宗中得來的!我們必須用過去的文化偉蹟,人格典型來鼓勵我們向前,來領導我們奮鬥!我們不要發瘋地誇大狂,但是我們却不能缺少自尊。(子固, 1934 : 19)

子固先生的結論是:「我們需要民族信心,只有從過去文化中建立起我們的民族信心」,他並且舉孫中山的主張作為佐證:「中山先生在當時一班知識階級盲目崇拜歐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動地指示我們救國必須恢復我們固有文化,同時學習歐美科學。」(子固, 1934 : 20)孫中山因而捲入這場筆墨官司。

胡適認為孫中山之所以講過「中國先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都是「駕乎外國人」之上,乃是為了敷衍一般誇大狂的中國人,事實上如果「留心細讀」孫中山的講演,就可以看出他當時說那話時是很費力、很不容易自圓其說的,例如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他一方面頌揚固有的舊道德,一方面却指責中國人的「修身」工夫很缺乏,一舉一動都欠檢點,應該學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其次就「仁愛的好道德」而言,在實行方面中國人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所以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sup>7</sup>由於一般人若是頌揚舊文化,就要排斥外國人的新東西,而孫中山却勸中國人向外國人學習——即便在修身、仁愛等課題上面亦然,這大概就是胡適所稱的「費力」、「不容易自圓其說」的地方。

孫中山在形式上主張「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胡適應不至於反對,問題是在胡適的認知裏,「固有文化實在太不豐富」,他以歷史學者「實事求是」的態度,尋求中國民族固有文化的優長之處,只得到「簡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會構造、薄弱的宗教心」等三點(胡適, 1934 d : 4),而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只不過是東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若要顧慮民族自信的來由,胡適的建議是:

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反省的結果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蠟鎗頭。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裏。我們的信心應該望在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下什麼種，出多少力。「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穫，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胡適，1934 b：5-6)

批評者認為，自信心固然應建立在反省的基礎上，但胡適的「反省」令人難以接受，因為「知恥」雖然可以作為努力的原動力，可是過份的自愧也會造成民族自暴自棄的心理，造成他對於其他民族卑躬屈膝的心理，因此反省的時候應該優劣並提，人們才有努力的勇氣(吳其玉，1934：20-21)。然而，胡適經由對固有文化的「認知」，導引出那樣的「態度」，是很合邏輯的，除非能指出該項認知的錯誤，否則僅對那種態度的可能後遺症作文章，是不濟事的。大約一年以後，吳景超指出中華民族適應自然環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與任何民族比較都無愧色」，這些生物領域的事實「可以作我們自信心的根據」(吳景超：1935 a：7)；潘光旦則認為一個民族的品質是一種流動的東西，這一代與下一代之間，即可因選擇作用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目前的優點固然可喜，但若不加以護持培養，下一代也許會逐漸消磨，反之，目前的弱點，也未嘗不可因選擇的得當，而逐漸糾正(潘光旦，1935：10-11)。這些，都可以作為「固有文化與民族自信心」此一論題的註腳。

### 三、民權主義方面

#### (一) 檢討訓政論

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通過「訓政時期之規定案」，內稱「訓政時期規定為六年；至民國廿四年完成」，然而九一八事變以後，二十一年召開的國難會議中即有人建議提前結束訓政，只是經表決未獲通過，當時通過的決議是「如期」結束訓政——亦即二十四年之意(沈雲龍，1981：348)；可是到了二十四年年底，政府却沒有結束訓政的意思表示，因而又引起批評的聲音，例如羅隆基說：「我們只懇切的請求政府履行他以往的決議。……政府說了話應該算話，……六年

結束訓政的期票，如今到期了，到期就應兌現。」（羅隆基，1935：5-6）擁護訓政的方面則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服務於外交部歐洲司的許持平，他首先承認「過去幾年來的訓政」誠然成績太差，部分原因是國民黨許多幹部的「墮落和懈怠」，但是「外敵的侵凌」和「世界經濟衰落的波動」也是阻礙訓政的原因，更何況即使沒有這些原因，訓政也不是在短短幾年內所能完成的，因為：「這樣龐大而複雜的國家，具有這樣深遠的傳統的病根，人民是這樣缺少政治的素養，生產技術和組織是這樣的落後，……平心說一句，訓政要不是有二三十年確確實實有計劃的努力，是很難望成功的」，所以許持平認為，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訓政應該結束與否、憲政應該開始與否的理論問題，而是在於怎樣開始真正的訓政，怎樣有效地推進訓政的事實問題（許持平，1935：9-10）。這番道理其實是在肯定「訓政之必要性」的前提下，主張「以更嚴格的訓政來解決訓政的問題」，以致當期獨立評論的「編輯後記」乃批評道：如果有人懷疑訓政的方法——尤其是一黨專制的訓政方法——是準備憲政的正確路途，許先生却沒有舉出理由來證明這個根本懷疑的不確。

原來孫中山對「訓政」二字的解釋是：「須知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來被壓作奴隸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會作的。所以我們革命黨人應該來教訓他，如伊尹訓太甲樣。我這個訓字，就是從伊訓上『訓』字用得來的。」（孫文，1973 b：398）其中蘊含著兩項基本假定，一是民主政治下的人民須具備一定的文化條件，而當時的中國人民尚未具備，二是認為透過「革命黨」來教訓人民，可以使人民具備所需條件。獨立評論中批評訓政論的人，大致亦能環繞這兩個要點來攻擊。

首先，胡適曾經提出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胡適，1933：5）胡適的目的是在鼓勵國人對民主的信心，不要把民主憲政看作高懸的理想，但是這種論證方式的瑕疵顯而易見，丁文江即認為它是「不可通的」，因為事實上採用獨裁制度的國家（如俄、意、德）正是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而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却是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丁文江，1934 b：5-6），張熙若更從邏輯上指出另一種「不可通」，亦即用



幼稚園、研究院來比擬民主政治、獨裁政治的話，那麼等到逐漸推廣政權（逐漸升學上去）以後，會變成高度的民治或是專制獨裁？（張熙若，1937：3-6）

後來張佛泉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胡適的這層意思。張佛泉說，清末以來許多有影響力的政論家或政治家，對憲政都有一個錯誤的見解，從而影響到我國的政治發展，這誤解就是把憲政看得太死板，把理想懸得高不可及，懸在我們生活之外，例如梁啟超的理想是全民政治，要人人「躬親政治」，孫中山亦強調直接民權——選罷創複四權，這樣高遠的理想當然很難達到，於是回過頭來慢慢準備階梯，所謂開明專制、所謂訓政之說便由此而來。張佛泉認為這種憲政觀念根本不對，「民治」應是一種過程，不能將它看作一個目標，我們應該設法在可能範圍內，得實行一分民治便實行一分民治，得實行兩分民治便實行兩分民治；最後他很自信地宣稱：「任何訓政之說，都受不了我們這論證的批評。依我們的說法，憲政隨時隨處都可以起始。有了一點憲政力量，便容它發揮出來；再有多多的，再容它發揮出來。」<sup>8</sup>

其次，蕭公權亦反對訓政論，但他對上述胡適和張佛泉的「憲政論」作了一些闡發和補充：

我個人也相信憲政是一種政治的生活方式，並不是高遠玄虛的理想。但如說它毫無理想的成分，却又似與事實不盡相符。現代憲政國家的憲法中不乏包含政治理想的實例。我覺得較妥當的說法似為：憲政是過程也是目標，而目標即是過程的一部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達目標，須經過程。要實現較圓滿的憲政，只有從較幼稚的憲政做起。……大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句話，也可以做一切「訓政」論的答覆。（君衡，1937：2）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先「出嫁」而後學「養子」比較合乎常理，可是「養子」究非易事，仍須「學習」方能做好，此點似為憲政論者的共識，所以這時蕭公權說「訓政的理論雖可推翻，政治程度的事實却不容否認」，而胡適與張佛泉也都主張逐漸推廣政權（例如先從城市、先從受過教育的公民開始）、逐漸「升學」上去，這方面胡適有一個著名的譬喻：

絕少數的人把持政治的權利是永不會使民衆得著現代政治的訓練的。最有效的政治訓練，是逐漸開放政權，使人民親身參加政治裏得到一點政治訓練。說句老話，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琴可彈。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胡適，1935：11）

吾人不妨稱之為「下水學泳論」。針對訓政論的第二假定——由革命黨來教訓人民可以造就合適的民主文化，「下水學泳論」應是一個有力的反駁。

## (二)對五權憲法的批評

依照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第十九條規定：「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至於訓政時期是否即應實行五院制，不得而知。不過在民國十七年國民黨的北伐軍事成功以後，胡漢民和孫科先後回國，提出兩點主張而成爲「國民政府組織法」的基本原則：一是訓政時期即應實行五院制度，二是中央政府的組織採用極端的委員制，後者由於沒有「遺教」的依據因而在二十年即被改爲主席集權制，前者（五院制）乃成爲定制。儘管孫中山曾經說明五院制的諸多優點，但是訓政時期的試驗似乎不如人意，陳之邁批評道：

現行的政制推諉卸責，缺乏效率，是全國都知道都承認的事實。爲什麼現在的政府如此令人不滿意呢？據我們的觀察，這是五院制當然的結果。……五院制度脫胎於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五院制度把權力更分得仔細：治權與政權分開，治權拆裂成五，政權割劃成四。……我們希望政府發揮最高的行政效率，然而我們的政府機構是最笨重的，近年來政府效率的特低正是五院制度達到了它本來的目標。（陳之邁，1936 a：3-4）

張佛泉亦有類似的意見，他認爲國民政府的政制設計所依據的原則，至少有兩點錯誤，第一、始終未能擺脫孟德斯鳩的權力分立的理想，而充滿「不信任旁人」的心理；第二、把制裁政府的力量放在政府自身之內，若非弄得互相牽掣而無所作爲，即是制裁機關形同虛設。因此張佛泉建議，一方面要設法採用英國式的內閣制，以便加強中央政府的力量，一方面要使控制政府的力量在政府以外得到儘量發揮，也就是給人民較大量的自由（張佛泉，1936：2-3）。孫中山設計權能分開原則之下的五院制，主要目的在造成高效率的「萬能政府」，而竟遭到上述的批評，寧非可怪？不過有關政府效率的問題，還牽涉到行政官僚的素質、民意基礎之有無、以及是否有反對黨的監督等等因素，似難完全歸咎於「五權分立」，陳之邁也只說：「國民黨制憲的目標如在產生有效率的政府，那麼唯有放棄死守五院制度的精神（形式無關宏旨）。」因爲「政制本無絕對的標準，只有此時此地的標準。」（張佛泉，1936，2-3）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以汪、蔣為中心的國民政府畀予孫科立法院院長之職位，但孫科久未到任，九月末孫蔣晤於廬山，蔣接受孫的要求，擬召集一個全體中執委的會議以便討論憲法問題，孫始表示他已準備接長立法院。<sup>9</sup>從二十二年一月孫科抵南京視事，迄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布憲草為止，經過相當繁複的討論、修改過程（陳儀深，1987：146-151），對此，陳之邁有一綜括的批評：「……有的改正由中央指示原則，有的倡議於立法委員，有的則是專家的意見。……時而內閣制，時而總統制，時而委員制，時而集各制之大成，不免覺得制憲者對於政制的設計完全沒有確定的主張，只看一時的風尚。」（陳之邁，1936 a：3-4）然而吾人正可由此看出其他的意義，第一、內閣制、總統制或委員制的區分已成近代國家代議政治的「典範」，很難另闢蹊徑；第二、即使在接受國民大會及五院制的前提之下，要與內閣制、總統制或委員制相結合並非不可能的事。

一般而言，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人儘管對民權主義的政制設計並不滿意，但是除了張佛泉表現過「內閣制」傾向以外，其他人並沒有明顯的替代方案。例如對於最關重要的國民大會，胡適固曾批評它人數多、會期短，容易被少數政客所左右，必難行使其重大職權，但是若延長會期，讓代表們「多參與中央政事」，則胡適似亦能接受。<sup>10</sup>陳之邁在原則上接受國民大會制度，但認為應該設置「國民大會委員會」，使它作為行使政權的常駐機關，以便隨時質詢總統，並於必要時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罷免總統（陳之邁，1934：15-16）。他們之所以沒有明顯而徹底的替代方案，或許受限於知識，或許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角色的自我設限，也或許服膺陳之邁所揭櫫的標準：「政治制度本來便沒有絕對優劣之分，只問它是否能夠達到一時一地的共同目標。這便是說，那種政制最能達到中國現在的共同目標，那種政制便應今日在中國採行。」（陳之邁，1936 a：3-4）

## 四、民生主義方面

### （一）統制經濟的可能性

民生主義所主張的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耕者有其田等等，莫不涉及所有權問題的解決以及公權力的高度運用，茲事體大，民生主義可以說就是「國家社會主義」<sup>11</sup>，粗略地說即是一種「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

omy)，如果國家社會未具備一定的條件，勢必無法實現。不過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亦流行過「統制經濟」的口號，不論左傾或右傾的勢力，似都承認「放任經濟」的末日到了。一位署名「守愚」的作者說：

自從一九二八年蘇俄實行五年計畫以來，成效斐然，……自一九二九年各國商業恐慌後，……資本主義最固的國家，如美英德等，失業情形最烈。……反而蘇俄不但無失業，並且事浮於人，意大利亦比較的平穩。於是歐美各國的政府當局和人民，起初疑恨經濟統制的，現在逐漸覺得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方法固然是精良，生產的方向或漫無針指；人民生活程度固然是優越，却沒有永久維持這種程度的能力。……在我們中國，這個時髦名詞（筆者按，指統制經濟），忽然的幾個月之間，這樣風起雲湧的，我疑是歐美海風帶過來的餘波……。 (守愚，1933：7-8)

「守愚」先生似乎將「經濟計畫」和「計畫經濟」混為一談，但是他對蘇俄的良好印象，却是當時中國流行的風尚，從丁文江發表的二十篇「蘇俄旅行記」，以及蔣廷黻發表的九篇「歐遊隨筆」<sup>12</sup>，都可以看到他們對蘇俄各方面的贊譽。

除了世界思潮的影響以外，中國本身的狀況亦有「統制經濟」主張的誘因，北大經濟學教授趙迺搏認為：「在國難深重的今日，全國的經濟力量應集中於國防力之增厚，及生產力之增加，斷不能因私人的利益妨碍民族經濟的建設。……欲統制全國之經濟，必先有整個的計畫，須通盤籌算，妥為分配，以定各種建設進行之程序。」(趙迺搏，1937：14)然而統制經濟的主張畢竟不同於馬克思社會主義，並沒有「消滅私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終極關懷，仍然是清末以來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譯國家主義、族國主義)「無所不在」的時代特性使然。若純就發展程度而言，中國亦沒有「統制經濟」的條件，此點丁文江論之甚明，他認為「政權一天不統一，統制經濟是一天不可實行的」，「第二個必需的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否則「現在我們的銀行大部分在租界裏面，可以利用的現金大部分在外國銀行裏面，……一旦有統制的消息，資本在幾分鐘之內可以逃避的乾乾淨淨！」「第三個必需的條件是行政制度先要澈底的現代化。」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就想去統制經濟，就是「病急亂投醫」(丁文江，1934 a：18-20)。丁文江雖然在政治上主張「新式獨裁」，在經濟上則是抱持謹慎的態度。

獨立評論的時代距離孫中山的去逝不過十多年，中國「患貧而不是患不均」的

情境依舊，資金與人才兩缺的狀況依舊，因而孫中山所開的藥方，仍會出現在獨立評論的文字中，例如吳景超在檢討「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時候，認為累積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便是利用外資，他說「利用外資的弊，是可以用外交的方法剷除的」，「至於利的方面，外人在中國投資，除加速中國的工業化外，還可使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降低；農民的产品，添一顧主；失業的工人，多一謀生的機會；空虛的國庫，多一稅源。」其次在技術人才方面，特別在重工業，吳景超說「現在恐怕還要借重客卿。救濟的方法，治標自然是繼續過去的留學政策，治本還在充實本國的大學及研究院。」（吳景超，1937：4，5，9）這些意見與孫中山「利用外資外才」的主張如出一轍，同時也是比較務實的發展策略，無須勉強劃歸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範疇。

總之，「統制經濟」一詞在獨立評論中並沒有確定的意涵，只知道有別於馬克思社會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如果把它理解為一種遠程的主義、理想猶有可說，如果把它作為國難時期的救濟良方，似乎不切實際。

## （二）農民問題的解決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已有形形色色的鄉村建設運動，到了民國二十年，梁漱溟在山東成立鄉村建設研究院，可說是集鄉建運動之大成，使一九三〇年代成為鄉建運動的「全盛期」。鄉建運動的理論——或稱村治論——目標是在解決整個的中國問題<sup>13</sup>，若就經濟而言，亦非某些人所批評的主張「復古」、反對工業化，自稱是一個「從事農村合作下層工作」的姚溥蓀，嘗在獨立評論中表示：

復興農村則不獨可以提高農村的購買力，幫助工業化，且還可以消弭匪患，澄平政治，似為治本之要圖。並且復興農村的工作在政府指導下可以做，在學術團體倡導下可以做，在研究機關領導下亦復可以做，無需乎統一的中央政權。……所以我們私心的主張，與其高唱中國工業化，盍若稍盡棉薄致力於鄉村建設。（姚溥蓀，1935：16）

然而獨立評論中也有很大的聲音反對以上的看法，最著名的是吳景超，他認為「以農立國」的路就是以筋肉方法生產的路，會使人貧窮、愚笨、短命，而「以各種實業立國」的路也就是以機械方法生產的路，才能使人富有、聰明、長壽，因此「我們沒有歧路」，只有努力走上工業化的路才可以圖存（吳景超，1934：2-7）。不

過吳景超並非「不關心農民」，相反地他幾度呼籲要「耕者有其田」：

中國沒有田的農民以及雖有田而不夠的農民，仍佔全民二分之一以上，……。民生主義裏，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發的，可是國民政府已經成立了若干年，對於如何實行孫中山先生遺教的這一部分，竟絲毫沒有表現，未免令人感覺失望了。最可笑的，就是共產黨以前在江西實行的土地政策，某院長在公開談話中，竟說他們是從三民主義中偷去的。我們覺得主義與財富不同，是不怕別人來偷的，同時也不可學守財奴的辦法，把它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而不拿來使用。<sup>14</sup>

蔣廷黻亦有類似的看法，他說：

中國整個的鄉村經濟已到崩潰的程度。這是中國的致命之傷。……耕者有其地是國民黨的黨綱，也是國家的安寧及人民的生計所必須的。共產主義的土地政策實在是土地公有，不是耕者有其地。在蘇維埃區域內，共黨不過替國民黨實行了國民黨的黨綱，而國民黨不過落後了。……政府應在共黨勢力未發展的省分趁早組織土地研究委員會，妥籌耕者有其地的實施方案。（蔣廷黻，1932 a：6-8）

相對於鄉建派之以「社會運動」的方式解決農村問題，吳景超、蔣廷黻等「都市型」知識份子則比較信任政治力量，即由政府來推動耕者有其地的政策，而這正是孫中山的想法。

其實，嚴格說來「耕者有其田」只是一項階段性的農業政策或土地政策，不是永久性的土地制度（平均地權才是）（蕭錚，1968：91-94），因而施行的時候更應注意嚴切的時空性。自稱是「江浙鄉下人」的吳世昌，就提出所謂農村破產應不限指佃戶的窮困，因為地主「也照樣破產」，他說「近十年來的地主則事實已經成為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紀人，而且是常常要賠本的經紀人」，所以他認為在田賦問題未解決以前，還談不上什麼「耕者有其田」的問題，「因為在現行的田賦制度之下，即使無條件把田分給農民，他們也納不起賦稅，只有更苦。」（吳世昌，1935 a：6-8）相對地，吳景超根據一些調查報告而認為，江浙一帶佃戶獻給地主的租，比地主交給政府的賦要多，換言之地主是有盈餘的，「他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剝削者，並不是賠本的經紀人。」（吳景超，1935 c：8-10）一個多月以後，一位居住「鄂東」的汪民楨撰文批評吳景超，認為他忽略了地主負擔的範圍——除了田

賦以外還有其他苛雜，忽略了地主的收入不能照現金折算——因為鄉間的穀米是只有價格而無買賣（汪民楨，1935：14-16）；這時吳世昌亦再度補充，說他早已承認「在年豐歲足的時候，地主固然安享現成，十分可惡」，但是不幸「這幾年來天禍中國」，水災旱災不斷，地主的確成為「賠本的經紀人」（吳世昌，1935 b：17-19）。然而吳景超還是堅持：「不能以一個地方的情形，來概括全國的地主。」（吳景超，1935 d：12-14）以上有關「地主負擔」的辯論，對於情感勝過理智的人、或意識型態取向（ideological orientation）的政策，應能發揮一些制衡的作用。就孫中山而言，雖然晚年比較重視農民運動，但是當他提到中國農村的景況時說：「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我們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為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要等你們再去調查。」——這種「還要再調查」的態度很值得注意，而且他雖然稱贊俄國「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但是他不主張在中國使用俄國的「急進」方式，而是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去「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孫文，1973 b：719-723）如果按照共產黨的分類，這種立場即是「資產階級改良派」，與前述獨立評論的作者豈非「一丘之貉」。

## 五、結 語

大陸學者耿雲志，在描寫「從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胡適的政治態度的變化」時，認為五四時代的胡適「基本上還能保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新月雜誌時期由於胡適與國民黨之間尚未「互相認識」以致衝突連連，「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們終於「互相認識」了，從此他們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胡適不折不扣地成了統治集團中的一員，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官方學者。」<sup>15</sup>耿雲志的根據就是獨立評論上那些宣揚「對日妥協」、「依靠國聯」，以及宣揚統一論、「為蔣介石的獨裁張目」之類的文章（耿雲志，1985：234，235）。吾人固然承認，在國難時期，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難解的緊張關係，<sup>16</sup>但是若說自由主義者向民族主義繳械，甚至向「獨裁」投降，則是言過其實，觀乎獨立評論被查扣停刊的狀況，或因攻擊黨義、或因批評外交部「膽怯含糊」的對日態度、或因反對陳濟棠的「提倡讀

經」、或因觸怒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陳儀深, 1987: 7, 8), 可見他們還能遵守創刊號引言所提的: 「不倚傍任何黨派, 不迷信任何成見, 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 這是獨立的精神。」

本文的範圍集中在三大主義的分別討論, 不免忽略其他綜合性的批評, 筆者不忍遺漏的是, 胡適曾對「奉行遺教」的人提出質疑: 「孫先生遺著有幾十萬字, 那一部分的『遺教』是我可以接受的? 那一部分是我不能接受的? 孫先生的政治主張有早年晚年的不同, 而全是遺教, 是不是我們全得接受?」(胡適, 1937: 20) 其次, 胡適也認為「建國大綱」是假定一個可以從容漸進的時勢, 而今既無此時勢, 吾人只能把他的理想計畫暫時留作一個供後人來研究的歷史文件, 吾人應考察的是如何下手才能達成憲政的目標, 何種制度才能切合現實的需要, 不必去拘執「建國大綱」的條文(胡適, 1934 a: 5)。以上的看法, 是拒絕站在意識型態的立場, 而採取學術的觀點自然會推得的結論。

宣稱「奉行遺教」的中國國民黨, 在台灣執政已四十年, 台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 對孫中山或三民主義作過那些批評? 比起三〇年代獨立評論那短短幾年, 可謂「相形見絀」。筆者認為, 知識份子應該秉持「獨立精神」, 把孫中山放在近代中西思想史的脈絡中, 勇敢地批評、詮釋他, 庶幾能發現其思想之真價值, 否則若淪為定於一尊的官學, 孫中山思想必失去應有的地位。戒嚴時期, 這件事的責任主要在執政者, 解嚴之後, 責任已落到知識份子自身。

## 註 釋

1. 羅隆基在民國二十年曾致函胡適, 謂「前日上海民報……登一文, 說中國目前三個思想鼎足而立: (1)共產; (2)『新月派』; (3)三民主義。想不到新月有這樣重要。」見梁錫華選註, 胡適秘藏書信選正篇, 台北: 遠景, 民國71年, 初版, 頁368。胡適是新月事實上的領袖, 關於他在此時批評南京政府及孫中山思想的言論分析, 詳見張忠棟, 「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胡適五論, 台北: 允晨, 民國76年, 初版, 頁50-62。
2. 關於獨立評論的內容分析, 包括主要作者文章篇數的排名, 各類文章分佈的



- 情形等等，請見筆者撰，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民國76年，頁8-13。
3. 民國十二年底決定截留粵海關餘，是孫中山與西方列強劃清界線的具體表現，此舉似與聯俄有關。參見孫當時的談話：「截留關稅之決心」，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民國62年，初版，頁866-867。
  4. 關於孫中山一生尋求外援的經過，詳見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s. 3-4。
  5. 蔣廷黻，「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獨立評論45期，民國22年4月9日，頁4；不過同文中也說：「我深信現在惟一促進國聯和國際幫助我們收復失地的方法在於速圖內政的改革——或國家的現代化。」見頁2。
  6. 以上的討論散見獨立評論80、81、82、83、84、85各期。
  7. 原文請見孫文，民族主義第六講，國父全集第一冊，頁56-61。胡適的評論見「再論信心與反省」，獨立評論105期，民國23年6月17日，頁3。
  8. 張佛泉，「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獨立評論236期，民國26年5月30日，頁2-3。此外，張佛泉認為訓政的目的既然在達成憲政的理想，訓政時期即應開放黨禁，以便培養人民自治的能力和習慣。詳見「政治改造的途徑」，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卅四期，民國24年9月2日，頁5。
  9.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65. 本書作者認為由於孫科的身份特殊，如果把他留在政府外面畢竟是個「危險」人物，因而汪蔣政府在1932年畀予立法院院長職位；另一方面，孫科迎合制憲行憲的呼聲亦有其政治目的，蓋民國18年當他握有權力的時候，乃反對憲政，他說一般人民尚未受過足夠的政治訓練，憲法將只是一張廢紙；然而當他政治地位薄弱的時候，且憲政問題可用來削減蔣的控制權，所以在國難會議閉幕還不到兩星期，孫科就變成「立憲主義的冠軍」。
  10. 胡適，「論憲法初稿」，獨立評論96期，民國23年4月15日，頁4-5。又，陳受康則建議由人民直選立監委和總統，而加強國民大會的創制權，減少代表的人數，延長會期並增加召集次數，見氏著，「憲法初稿的國民大會」，獨立評

論99期，民國23年5月6日，頁13-17。

11. 民國元年孫中山曾經說：「民生主義，則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又說：「殊不知民生主義，並非均貧富之主義，乃以國家之力，發達天然實利，防資本家之專制。……中國十年以後，必至有十萬人以上之大資本家，此時杜漸防微，惟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此則兄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之微意也已。」語見「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以及「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國父全集第二冊，頁220，261。
12. 丁文江的「旅行記」發表在獨立評論101、103、104、107、109、114、116、118、119、122、126、134、135、146、152、156、168、169、174、175期；蔣廷黻的「隨筆」發表在獨立評論123、124、125、128、129、132、133、138、139期。值得注意的是，丁留學過英國，蔣是留美博士，對蘇俄仍有這樣的印象。
13. 梁漱溟曾經說：「我們固然不是工業資本的立場，亦並不是站在鄉村的立場，而是為中國社會建立根本大計。」見鄉村建設理論，山東鄒平：鄉村書店，民國25年，頁395。
14. 吳景超，「耕者何時有其田」，獨立評論165期，民國24年8月25日，頁5-6。另外，獨立評論的社員吳憲亦認為鄉村建設是一件「不揣其本而求其末的事」，所以註定要失敗，因為農民的生活僅夠糊口，那裏還有錢做建設的事？農民不能增加生產則不能談鄉村建設，而增加生產（收入）唯一的方法就是興工業。濤鳴，「此路不通」，獨立評論209期，民國25年7月12日，頁15-17。
15. 該文收入耿雲志著，胡適研究論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16-239。不過耿雲志亦承認：「胡適對蔣介石的國民黨並不很滿意，但在他看來，茫茫禹域只有蔣介石可以對付共產黨，控制全國政局。因此他支持蔣介石，而主觀上未嘗不想引導蔣介石走上美國式的『民治』之路。」見頁239。
16. Eugene Lubot對現代中國的「新文化自由主義者」較有同情地瞭解，他以英國經驗為例，說明自由主義的成就是由於非常多樣的歷史勢力的結合，不能全然歸功於自由主義者及其意識型態，同樣地，如果把中國自由主義的挫敗完全歸責於「新文化自由主義者」也是不公平的。見Eugene Lubot, *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 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2, p.130.

## 參考資料

丁文江

1934 a 「實施統制經濟的條件」，獨立評論 108 期，民國 23 年 7 月 8 日。

1934 b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獨立評論 133 期，民國 23 年 12 月 30 日。

子 固

1934 「怎樣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獨立評論 105 期，民國 23 年 6 月 17 日。

守 愚

1933 「統制經濟與全國經濟委員會」，獨立評論 70 期，民國 22 年 10 月 1 日。

君 衡(蕭公權)

1936 「均權與均勢」，獨立評論 210 期，民國 25 年 7 月 19 日。

1937 「憲政的條件」，獨立評論 238 期，民國 26 年 6 月 13 日。

汪民楨

1935 「讀『論地主的擔負』」，獨立評論 180 期，民國 24 年 12 月 8 日。

沈雲龍

1981 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吳世昌

1935 a 「耕者肯有其田嗎？」，獨立評論 180 期，民國 24 年 12 月 8 日。

1935 b 「田主擔負的討論」，獨立評論 180 期，民國 24 年 12 月 8 日。

吳其玉

1934 「讀『信心與反省』」，獨立評論 106 期，民國 23 年 6 月 24 日。

吳景超

1934 「我們沒有歧路」，獨立評論 125 期，民國 23 年 11 月 4 日。

1935 a 「自信心的根源」，獨立評論 161 期，民國 24 年 7 月 28 日。

1935 b 「耕者何時有其田」，獨立評論 165 期，民國 24 年 8 月 25 日。

1935 c 「論地主的擔負」，獨立評論 175 期，民國 24 年 11 月 3 日。

1935 d 「再論地主的擔負」，獨立評論 180 期，民國 24 年 12 月 8 日。

- 1937 「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獨立評論 231 期，民國 26 年 4 月 25 日。
- 胡 適
- 1932 a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 18 期，民國 21 年 9 月 18 日。
- 1932 b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獨立評論 21 期，民國 21 年 10 月 9 日。
- 1933 「再論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 82 期，民國 22 年 12 月 24 日。
- 1934 a 「論憲法初稿」，獨立評論 96 期，民國 23 年 4 月 5 日。
- 1934 b 「信心與反省」，獨立評論 103 期，民國 23 年 6 月 3 日。
- 1934 c 「再論信心與反省」，獨立評論 105 期，民國 23 年 6 月 17 日。
- 1934 d 「三論信心與反省」，獨立評論 107 期，民國 23 年 7 月 1 日。
- 1935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獨立評論 171 期，民國 24 年 10 月 6 日。
- 1936 「國聯還可以抬頭」，獨立評論 202 期，民國 25 年 5 月 24 日。
- 1937 「編輯後記」，獨立評論 232 期，民國 26 年 5 月 2 日。
- 1986 a 丁文江的傳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1986 b 我們走那條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孫 文
- 1973 a 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1973 b 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姚溥蓀
- 1935 「不復興農村中國也可以工業化嗎？」，獨立評論 137 期，民國 24 年 1 月 27 日。
- 許持平
- 1935 「憲政可以開始了嗎？」，獨立評論 176 期，民國 24 年 11 月 10 日。
- 耿雲志
- 1985 胡適研究論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梁漱溟
- 1936 鄉村建設理論，山東鄒平：鄉村書店。
- 陳之邁
- 1934 「評憲草」，獨立評論 129 期，民國 23 年 12 月 2 日。

- 1935 「統一的基礎」，獨立評論 134 期，民國 24 年 1 月 6 日。  
1936 a 「論政制的設計」，獨立評論 199 期，民國 25 年 5 月 3 日。  
1936 b 「論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獨立評論 208 期，民國 25 年 7 月 5 日。  
1936 c 「論均權與統一」，獨立評論 211 期，民國 25 年 7 月 19 日。

陳受康

- 1934 「憲法初稿的國民大會」，獨立評論 99 期。民國 23 年 5 月 6 日。

陳儀深

- 1987 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張忠棟

- 1987 胡適五論，台北：允晨出版公司。

張佛泉

- 1935 「政治改造的途徑」，國聞週報 12 卷 34 期，民國 23 年 9 月 2 日。  
1936 「今後政治之展望」，獨立評論 219 期，民國 25 年 9 月 20 日。  
1937 「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獨立評論 236 期，民國 26 年 5 月 30 日。

張熙若

- 1937 「民主政治當真是幼稚的政治嗎？」，獨立評論 239 期，民國 26 年 6 月 20 日。

傅孟真

- 1936 「國聯之淪落和復興」，獨立評論 200 期，民國 25 年 5 月 10 日。

趙迺搏

- 1937 「經濟計劃與統制」，獨立評論 242 期，民國 26 年 7 月 11 日。

潘光旦

- 1935 「論自信力的根據」，獨立評論 160 期，民國 24 年 7 月 28 日。

蔣廷黻

- 1932 a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獨立評論 11 期，民國 21 年 7 月 31 日。  
1932 b 「南京的機會」，獨立評論 31 期，民國 21 年 12 月 18 日。  
1933 a 「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獨立評論 45 期，民國 22 年 4 月

9日。

1933 b 「帝國主義與常識」，獨立評論 71 期，民國 22 年 10 月 8 日。

蕭 錚

1968 平權地權之理論體系，台北：中國地政研究所。

濤 鳴（吳 憲）

1936 「此路不通」，獨立評論 209 期，民國 25 年 7 月 12 日。

羅隆基

1935 「訓政應該結束了」，獨立評論 171 期，民國 24 年 10 月 6 日。

Eastman, Lloyd E.

1974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bot , Eugene

1982 *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 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 , 1919-1937 .* Westport , Conn. :Greenwood Press.

Wilbur, C. Martin

1976 *Sun Yat-sen :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 The Discussions Related to San-min-chu-i in *Independent Critic*

Yi-Shen Chen

### Abstract

*Independent Critic*, published from 1932 to 1937 and edited chiefly by Hu Shih, was a weekly magazine of political comment, and the main contributors were the professor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1930s was not only a time of KMT's tutelage but also a time of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main contributors of *Independent Critic* stood on the position of liberalism, criticizing the problem of constitutionalism, diplomacy, economy, education, etc. at that time. But this article only concentrated to analyze their views about "San-Min-Chu-I".

In Sun Yet-sen's late years, he promoted "anti-imperialism", which did become the trend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but Hu Shih and Chiang Ting-fu thought the slogan of "anti-imperialism" impractical and that Chinese should have had self-examinations of thei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weakness. In Hu Shih's mind, to criticiz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did not conflict with his belief of nationalism. There were controversies in *Independent Critic* about whether it was better to unite China by force or in a peaceful way, and this kind of controversies to some extent were originally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standing of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

Hu Shih, Chang Fo-chüan, and Hsiao Kung-chuän did their best to give criticism about the theory of tutelage on Min-Chuän-Chu-I (democracy), and the criticism of five-yuan system given by Chen Chih-mai was worth mentioning,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 obvious replaceable design in *In-*

*dependent Critic*,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with regard to political systems, there wasn't any perfect and unique standard but the standard at the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place.

As for the respect of Min-Sheng-Chu-I (socialism), there were controversies in whether China was suitable to perform "controlled economy" in the 1930s. Ting Wen-chiang, who advocated dictatorship, thought that there was not the condition for China to perform "controlled economy" yet. Regarding the tenant farmers' problems, there was no objection to "land to the tiller" in principle, but there were different evidences and views about the degree of burdens between land-owners and tenant farmers. This means that, they were searching for a reformative way rather than a revolutionary way to resolve countryside problems. From the above, the consistent standing of the liberalism to the various problems seems to be found.